

杨贵妃

南宫博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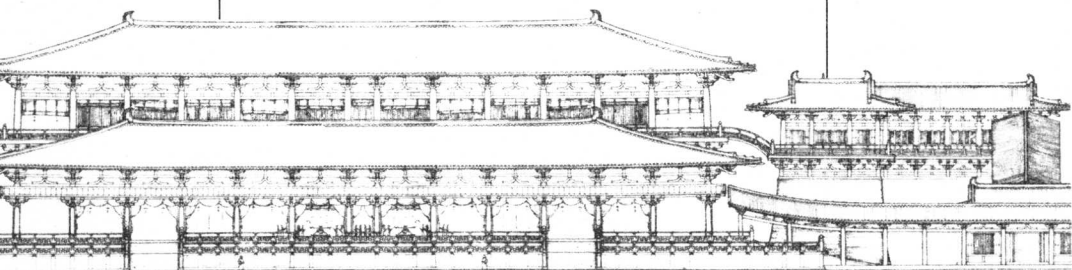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匯出版社



杨贵妃

南宮博◎著



文 匯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贵妃/南宫搏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 2005. 5
ISBN 7-80676-822-X

I. 杨... II. 南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3783 号

杨贵妃

编 著/南宫搏

责任编辑/王均熙

封面装帧/钱自成

出版发行/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/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90×1240 1/32

字 数/390 千

印 张/13

印 数/1—10000

ISBN 7-80676-822-X/I·157

定 价/26.00 元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,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总 序

龚鹏程

杨
贵
妃

历史小说的身世，颇为曲折，要从古代谈起。

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，本身就是一种史述，是一种史籍。小说家可能就是采集民间琐闻杂话的史官，故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小说出于稗官野史、巷议街谈。而《汉武故事》、《西京杂记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续齐谐记》等小说也被纳入史部起居注或杂传类之中。

到了唐宋间，说书人讲说故事，逐渐便改变了小说的涵义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等书记载，当时说话人可以分成几类，当时称为“家数”。其中之分类各书记载有些差异，但大体有四大家数：讲史、小说、说经、说诨话。说诨话，是讲笑话、逗趣，可能近于相声、滑稽、插科打诨之类。说经，是讲佛经。讲史与小说，则是古代小说的分化。仍以描述历史事迹、勾勒历史大势、演说历史人物之行动及典型者，称为讲史。而那些仅借用某些历史场景，或以历史故事原材料，来讲述人物发迹变泰，悲欢离合者，则称为小说。

所以《梦粱录》说：“小说名‘银字儿’，如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杆棒、发迹变泰之事。”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：它可能写古代事，也可能讲当代。若写古代，则虽借用历史场景，但它本身自成传奇，目的并不在述史。因此它并不以增进读者之历史知识、复现历史现场、探讨历史演变规律为宗旨，其虚构性也因此而较强。《梦粱录》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“顷刻捏合”，就是说它具高度虚构之性质。

经过这样分化之后，讲史与小说分途，各领风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之类杰出的历史演义。此类稗官野史，本出于巷议街谈；其流传，也深布于民间，中国人，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讲起。可是，讲史也者，便一朝一代，一路讲说弹唱下

来。因此,若问我们社会上到底认知了什么历史,正史二十五史或《资治通鉴》一类史籍的影响,其实远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义等讲史系统。

可是,讲史的势力,毕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反弹。稗官野史,原本就相对于正史官史而言。文人学士,也非田夫野老,夙不以巷议街谈为然。故清朝考证学大兴以后,鄙薄讲史,以史籍史事真伪之考订为职志,竟蔚为风气,像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就说:著作之体,要就实,要就虚。不能像《三国演义》那样,既不像正史那样符合“史实”,又不像小说那般全凭虚构,反而造成了读者的混淆。于是,讲史的地位,不仅及不上正史,也不如小说了。

这是讲史之命运的挫折。可是,它的噩梦并未停止。晚清以来,西力东渐,西方小说观进入中土,论者持此以衡,遂越来越对讲史看不顺眼。

现代小说观,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。小说既是作者之创造物,其人物、情节自必为虚构的。因此,会觉得讲史缺乏创造性,一切人、事、地、物均受限于史实,缺乏作者发挥想像力的空间。而一部缺乏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东西,还能是好作品吗?但若作者在讲述史事之中,添加了太多想像,甚或改动了历史结局,扭转了史迹之因果关系,其虚构性又不能令人忍受。非特不会被称赞,反而会被指责,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。处在如此左右不讨好的情况下,讲史的命运,可谓蹇困极了。

这也就是民国以来,缺少历史小说作家的缘故。

现代小说家也不擅长写讲史或历史小说。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,就是与传统的决裂。形式上,讲史、历史演义,都被视为旧文体,不再被小说家采用。内容上,现代文学又有去历史化的倾向,不再关怀历史。因此,现代小说家既乏历史知识,又无兴趣处理历史题材。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,毕竟,其关怀业已不同了。

现代文学两大阵营,一是现代主义,一是现实主义。现代主义旨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,现实主义则以反映社会为目标,它们的关怀所在,都不在历史而在现代。即或采用历史题材,如鲁迅之写《故事新编》,或后来的姚雪垠写《李自成》之类,目的也不在讲史,而在自抒怀抱,改造时代。

可是,人类对历史的情怀,仍是不可磨灭的。现代社会中,讲史仍以巷议街谈、稗官野史的形态在继续发展。刘绍唐先生主持《传统文学》月刊,自号“野史馆馆长”。其所谓传记文学,实即古之所谓讲史也。

但传记文学发展至今,在笔记、考证、述传等方面,固然足以绍续古人;然而衍古事以敷说,足以为古代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一类作品之嗣响者,实不多见。

高阳、南宫搏这几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这儿。

我们现在若把“小说”这个词的涵义放大些看,把古代“小说”与“讲史”两类都纳入现代的小说这个名义下,则现代小说是小说这一条脉络的发展,历史小说就是讲史的延伸。而前面说过,五四运动以后,现代小说蔚为大宗,而历史小说则较寂寥。高阳、南宫搏几位,自张一军,力撑半壁江山,读者群之广,一点也不逊于现代小说,确实可称为豪杰之士,难能而可贵。

南宫搏,本名马彬,浙江余姚人。从事历史小说之写作,比高阳还早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在香港,即出版过《圆圆曲》、《风波亭》、《桃花扇》等书,其后陆续写出《武则天》、《杨贵妃》等数十部。他与高阳一样,都长期在报业供职,也能写现代小说,但生面别开,为文坛所重者,终究还是历史小说这一方面。

在这方面,南宫搏衍讲史之绪,既用小说形式,也仍保留了传统稗史的型态,有《中国历史故事》、《中国历代名人轶事》等书。小说则除了少数写奇男子,如《吕纯阳》、《鲁智深》、《韩信》、《李后主》,写大时代,如《大汉春秋》、《玄武门》之外,比较集中写历史上的女人。

先后曾写过的女人,包括嫦娥、妲己、西施、蔡文姬、江东二乔、刘兰芝、甄妃、祝英台、乐昌公主、虢国夫人、杨贵妃、武则天、鱼玄机、李香君、潘金莲等,甚至还有一本《妈祖》。

高阳生前,我曾问过他对南宫搏小说的看法,他未正面回答我,只说南宫搏对《唐史》等是很熟的。我明白他如此说,是“不相菲薄不相师”之意。历史小说作家原本就很少,故没有文人相轻的本钱。称许南宫搏史事精熟,则是肯定他作为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资格。可是高阳与他,写作历史小说的心态、目的及写法,互不相同,是以高阳不愿正面讨论评鹭南宫。

事实上,南宫搏虽然著作在六十种以上,读者遍及整个华人世界,却并无正式研究文章讨论过他,比高阳更不受现代文学界正视。高阳物伤其类,不愿矜伐,不随口批评同道,实在是他的好德行。但若从吾人读者的角度看,拿他们两位做个比较,其实正是必要的。

因为,高阳与南宫搏,乃是台湾历史小说写作之两型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,早期着重于讲说传奇,例如写李娃、风尘三侠、杨乃武与小白菜、李师师周邦彦等。后来则历史意识越来越强,一方面结合他的史事考证,以考得者推拟模构,类似重建历史现场,如写李商隐、董小宛、曹雪芹、龚自珍等都是。对“历史疑案”,深感兴趣,小说和考证交互为用。另一方面,则企图找寻历史变迁的因素,以“通古今之变”。他反复提到朝廷和士人的关系,认为士人政治是否健全,乃国家是否康顺的主因,故其小说,着墨于宫朝政局及士大夫生活者甚多。所以说,他的小说,是充满历史意识,着眼于历史整体的。因此他的写法,也就较少单一主线、单一主角,常会以“跑野马”的方式,勾勒社会整体,对历史场景中的典章制度,名物风俗,人际网络,非常注意。

相较于高阳,南宫搏所关怀的,是个体化的历史。

从题材上看,南宫搏写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。为什么专挑女人,写些风流韵事呢?是作者意存佻挞、性好风流吗?不然。女人的身世,跟宫朝政局时代社会、人际网络,基本上无甚关系。这些女人,是因与君王等特殊男人有关了,才间接与这个社会和历史有关的。关联起来以后,她们可能被指责为祸国之妖姬,可能成为时代沧桑的见证。但就她本身来说,她的生命、喜怒、情爱、遭际,其实自成脉络、自成风景。南宫搏所要描绘的,就是这一段风景,因此,他不但关切历史中的个人,还希望能检索大的社会历史之外的个人史。

他有时也写对历史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人物,如韩信、光武帝、唐太宗。但重点并不在刻画那个时代,说明这些伟大人物如何开创了大时代,如何成就其事功。反而去讲诸如光武帝为何一直为了阴丽华而与严光在心底上较劲;李世民如何算计着要发动玄武门事变,而结交齐王元吉妃及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妹妹常婉之类的事。他写太平天国,主线也不放在洪秀全、杨秀清、石达开等人身上,而放在洪宣娇。

南宫搏本人甚少论及他如何写作历史小说,我仅见的一篇,是《从紫风楼到韩信:兼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书》。据他说,他的历史小说写法,直接受德国作家勃勒诺·弗兰克(Bruno Frank)的影响,喜欢以一个人为主线,而以其时代背景陪衬这一个人物,让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反映出来。这也就是我所说的,他惯于把历史个体化,去描绘个体化的历史。历史或时代,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。

要这样写,其实并不容易,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,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,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。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,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,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象。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,也不忌讳,乐于质疑正史、怀疑其合理性,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。

高阳则相反,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,故小说虽非史述,意亦不在证史,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。因此,两人的不同,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,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,有此两大典型,足堪珍视。

唯高阳故世之后,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,尚不寂寞,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,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,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。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,如今思之,殊不免于缅叹。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。如今麦田出版社访得南宫搏旧作数种,校订重刊,令人欣喜钦敬不已。历史小说的命运,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,焕发出新的风采,也未可知。

龚鹏程先生

- “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”博士。

- 荣获中山学术文艺奖、中兴文艺奖章文艺理论奖和“行政院”杰出研究奖。

-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学院院长、南华管理学院校长、“行政院大陆委员会”文教处处长。

- 现任佛光人文社会学院院长。

作者序

“杨贵妃”其人其事，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共同题材，有一千两百年之久了。我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，在二十多年间，计有五次，当然有不同的接触面与不同的形式。而这本书则是全面的，写“杨贵妃”的一生。

为了印书，我以一星期的时间整理和校对，自己细心地看了一次，我愿意说：这是我自认写得很好的一本书。不辞狂妄之嫌，我又愿意说：这是一千两百年以来，以“杨贵妃”为文学创作的共题以来，一本最完整和恰当的书。

这本书使我敢于自傲——在我从事创作的生命中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用“自傲”一词。

在写作的风格上，《杨贵妃》也有了若干变化，以一个人为中心反映一个时代的方法依旧（这是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，和中国的“演义”完全不同调）；但在取材方面变了，我想称《杨贵妃》为“历史的小说”而不仅是“历史小说”。“历史小说”大致可以不照顾人物故事的时间、地位以及故实的正确性，“小说”不同于“历史”，在于它能移动若干人事而配合，亦不必理会典章制度上的细节。而在《杨贵妃》一书中，我尽量地考据事实，人与事，努力求其真实，于尽可能求真中再以小说的技术来组织和配合。《杨贵妃》主要人事发展，大致上与当时时事相吻合，正确处超过了现存的正式史书。写作小说，原无如此的必要，而我所以如此做，希望开创历史小说的另一条路。这条路是否适宜、正确，则不是我自己所能许定的。我尝试着，以欧洲历史小说风格而归淳于中国情调，在《杨贵妃》这本书中，我自以为做到了。

现代化的中国历史小说，由我具体地开创，在日本和英国，卖书宣导

品称我为“第一人”，这“第一人”如撇开作最好的解释而指为开路，我当之无愧，二十多年前，我尝试着以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有系统地写长篇中国历史小说，当时影响我最深，使我从事摹拟的人，第一个是德国的历史小说作家勃鲁诺·法兰克(Bruno Frank)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，他的作品风靡一时，开创德国文坛写作历史小说的热潮。其次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米契生夫人(Mrs. Naomi Margaret Mitchison)和十九世纪末名气很大的英国历史小说家韦曼(Stanley John Weyman)，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享名的格兰扶斯(Robert Graves)等人。我曾经尝试着以法兰克的风格作为基础汲取早期的韦曼、近期的(三十和四十年代)格兰扶斯，再加上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(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)的手法，用来写我的历史小说，二十多年来，我有过失败的作品，也有过自己满意的作品，以《杨贵妃》一书而论，我大致能超越韦曼和脱出了法兰克的藩篱，不再是摹拟而有了我自己的以及中国的。

我自行推荐《杨贵妃》这本书。

《杨贵妃》是先报纸连载的，连载之前，我作有两篇“前记”：一、杨贵妃，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；二、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。这是论事和考据性的，在写作时很用了一番工夫，如今作为“附录”。

其次，在报纸上发表时有“第九卷”，那是传奇，于第九卷之前即已说明，现在作为“外传”。“杨贵妃”故事似乎应该在马嵬驿结束的。“外传”的故事不忍弃之原因是：我曾为此“传奇”而在日本像傻瓜那样从事搜访——搜访并无实际的获得。

《杨贵妃》一书于一九七二年秋末动笔，次年夏完成，中间有五十多页是在伦敦写的，其余则在香港写的。

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于香港

目 录

总序

..... 1/5

作者序

..... 1/2

第一卷

..... 1/11

第二卷

..... 12/76

第三卷

..... 77/109

第四卷

..... 110/136

第五卷

..... 137/191

第六卷

..... 192/240

第七卷

..... 241/300

第八卷

..... 301/330

杨贵妃外传

..... 331/383

《附录》一

..... 384/389

《附录》二

..... 390/401



第一卷



大唐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，天气很冷，留守洛阳的官员，冒着寒风，排队迎接自长安来到东都的开元皇帝。

这样冷的天气，皇族通常会在长安近畿的骊山温泉宫避寒。然而，开元皇帝却在正月的寒天，带了百官，皇族中主要人员、侍从、兵卫等两万五千多人，行于道路，冒严寒风雪而来——洛阳区内虽然没有下雪，但东都留守官员知道，皇帝一行在过潼关时曾遇雪。虽然如此，皇帝的车骑到达时，仪容鲜明，并未因寒冷和旅途风雪而显出惫颓。

皇帝已有两年又四个月不曾来东都洛阳了，至于选在正月间驾幸东都，更久，足足隔了十二年。

欢迎的队伍排得很长，高级官员和东都的留守官员，聚在前面，地方的中下级官员，则排队在黄道桥堍的洛水边，水边风更冷，有不少着了吉服的官员，身体在打颤。

河南府的土曹参军事杨玄璈，没有排入欢迎队伍中，他主管车仗调度，在天津桥到黄河桥之间，走来走去，很忙，别人觉得冷，他却在出汗——

车驾自端门进入皇城了，含元殿有朝仪，百官鱼贯而入，郊迎的大典礼告了一个段落。

做地方佐贰官的人，没有资格参加朝会，纷纷散去了。土曹参军事杨玄璈却不曾走，他还要指挥人照料属于地方调来的车仗，不过，他本身不需要走来走去了，留驻在旧中桥的站内，听取各处报告，命佐史记录下来。

隔着旧中桥，在洛水之间的河岸上，仍然挤满了洛阳百姓，他们已有两年多没见过这样大的场面，留着，不肯立刻散去。

不久，皇城的左右掖门都有官员们出来——那是散朝，皇帝第一天到达时的朝会，依例不议事，因此，朝会很快就散。

在洛水的两岸，无数看热闹的百姓中，有河南府土曹参军事杨玄璈的女儿在。

她是悄悄地出来的，现在陪她出来的老家人和保母，紧张地催她快些

回家。

十六岁的杨玉环有一些依依地，但她又很听话，接受劝告后就转身走，一面说：

“总算运气不错，让我看到皇家的仪仗。”

她在兴奋中回家——她发现，她的哥哥仍然在书房，并未出去看热闹，为此，她叹息。

在书房中的哥哥，发现了妹妹，叫唤她。

妹妹向随在身后的婢女扮了鬼脸，进入。

“大人吩咐不可随便出去，玉环，你又不听话！”哥哥看妹妹入室，第一句话就是谴责。

杨玉环向兄长一笑，信口说：“好了，可别告诉大人！”接着，转身就走。但是，哥哥又唤住她，问她正月份的功课如何？她稍微停顿，用手指算着日子，再说：“正月大，还有四天，不妨！”

她走了，她的哥哥杨鉴，徐徐地站起来，在书房中踱步，伸舒双臂——他坐着读书写字，的确太久了些。

杨鉴和妹妹的性格不同，他好静，而且，承受父亲的教训，努力读书，希望由进士出身，正式做官，重振家声。他相信，父亲和自己一定会有发展的，那是正派的仕宦发展。杨鉴知道，父亲对士曹参军事的现职很不满意，他的祖父做过士曹参军事，可能因此，在去年秋末，吏部有些近乎作弄地把他的父亲又自中央政府放出，调到河南，官阶升了，职务也重要了，但是，那总是地方的事务官，前途并不好的。在此之前，他的父亲服官，由地方官入朝廷的秘书省，为正九品上阶的校书郎，品秩虽降了，但地位清贵，前途极好。这回外调，官品虽升到正七品下阶，高了许多，但是，格却低了。因此，父和子都心中郁郁。可是，做女儿的却一些也不理会，她喜欢洛阳，因为到了洛阳之后，父亲对她的管束放松了不少，再者，洛阳的住宅也比较大，她独占了一个院子，关上门，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园中玩。

她别了哥哥，就回到自己的院子，在生了火的屋子里，换上薄的衣服学舞。杨家在洛阳买入的一名使女，出身是歌舞伎，年纪大了，才被转卖做使女，但她的舞技仍然很好，她指点杨家的大小姐学动作快速的胡旋舞。

杨玉环在长安也曾学过歌舞——她的父亲只许她学音乐，但她背着

父亲学歌舞。长安贵家的女儿，都会学些歌舞，她以为父亲非但保守，而且顽固，她运用自己的智能，当面很顺应父亲，每月交文字上的功课，但背着父亲，又什么都干，长安女子流行的玩意儿，她样样都有兴趣。而且她还有好胜心，要赶在亲戚中的女伴们之前。

在长安，她没有机会学胡旋舞，现在，有了一个教习，她热中着，她明白胡旋舞最耗力气，每天要练，一荒疏，立刻就会旋不快和舞不久，因此，她虽然在外面看热闹回来，相当累，仍然不顾一切的练习着。

她舞出一身大汗，然后，去淋浴了——此时，她的父亲还未回家。

杨玄璈没有回家，并不是事忙，今天的事虽然是他上任之后最繁重的一次，可是，有近两个月的筹备，做起来有条不紊。但在事完了之后，他正要回家时，却遇上一位特出的朋友：杨慎名。

在长安时，杨玄璈外调之前，杨慎名以他的九十岁老父太府卿杨崇礼退休之故，以荫赐特擢为监察御史。慎名和玄璈在长安时多有相见，也谈得投机。大家姓杨，又都自称是后汉太尉杨震之后，论世系，杨玄璈是十七世，杨慎名则低至十九世，但他们在联族时却撇开了本就纠缠不清的世系，只以族兄弟相称。

杨慎名是随驾而来，他奉皇命，兼理东都著名的粮仓含嘉仓，因此，他一见杨玄璈，就强行留住，要求先了解一下东都仓库的实际情形。

杨玄璈自然乐于为之作详细介绍，因为，杨慎名的来历和皇家的关系以及受到皇帝宠信，不比平常。

第一，杨慎名是隋皇朝的直系子孙。隋朝末代皇帝杨广在江都被弑，他的儿子杨暕也被杀，杨暕妻有一个遗腹子杨政道，后来随了祖母萧皇后入突厥，再被唐太宗李世民俘回，李世民优待杨政道，正式让他做官，杨慎名是杨政道的孙子，隋炀帝则是他的高祖父。

亡国皇孙受到优礼而且担承实际职位的，在历史上极为少见，李世民在这方面表现了罕有的大度，他的儿孙，也同样地有大气度，隋皇朝杨氏一族，自唐初以来，一直服官。在本朝，杨崇礼很有名气，他担任主管宫廷的财货出入（太府卿）二十余年，成绩之好，超过从前任何一个人，每年为皇帝省下数百万缗钱。他退休前，皇帝给他户部尚书的官衔。三个儿子都受到照顾和置于要位，次子慎矜，继父亲入太府做出纳。

杨玄璈随了杨慎名在行馆谈了一些时，到行馆中要开晚饭了，他才

告辞回家。

杨家的晚饭是分开吃的，杨玉环在父亲回来时，正在内院吃饭，而杨鉴则陪侍父亲进晚餐。

晚饭之后，杨玉环循例出来见父亲一次——这是贵族之家的礼节。杨玉环着了家常晚服，还打扮整齐，斯文地做了这个每日必行的讨厌的仪式。然后，她辞出，去见母亲，再回自己的院子。

这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面，她虽然厌恶，可是，她又能做得很周到，至少，她使父亲满意。但她的内心对家却有着闷郁感，这是随年岁渐长而来的，她已经明白自己家族并非真正的山东世家，何必过分地装腔作势？

童年时在河中等地，生活很自由，但在到长安随父亲后，生活方式被迫改变了，但她又努力设法自己找寻娱乐，她希望出嫁之后，能够过自由一些的生活。

皇帝到洛阳之后，东都成了全国的政法、文化、经济中心，第一批来了两万五千多人，接着，百官的家族等得知皇帝会在东都住一个较长的时间，也陆续来了。再加四面八方的使臣和商人，洛阳的人口，到三月间，已添增了五万以上。

幸而洛阳城大，女皇帝武则天时代长期以东都为政治中心，皇城、宫城和民居，都有空间可容纳，人口增加，并不见得拥挤。再者，皇帝赶在正月来，主因是长安区域去年大歉收，粮食缺乏，到洛阳为了就食。而洛阳，储积饶富，人口虽增，食物供应仍然有余。何况，洛阳的交通方便，皇帝一来，东南的货物便迅速大量运到，一般物价，洛阳比长安低，长安贵人有钱，用得慷慨，洛阳繁荣了。

也由于皇家的到来，河南省的地方比平常忙得多——

杨玄璈时常因公而留宿衙门不回家；杨鉴，计划明年应进士考试，为自己的事而忙着。

杨玉环没人管束了，她常常找一些借口出游——现在，大批官员来到，其中有不少杨家的亲戚，她也因此而有了游伴。洛水把洛阳中分，水北岸和漕渠以西是皇城、宫城、皇家的苑囿。水南，是民居，还有南北行的漕渠以东的洛水北岸，也是民居。洛水支流多，贵族之家，家家有船。

杨家大小姐偶然会和长安来的女伴乘了船出游——在有一些河流上，洛阳的贵族青年，会停下自己的船，设法和女士们的船靠在一起，从

而打交道。

这是洛阳的传统风习。

杨玉环虽然大胆和好动，但她受严父管束，和男子们打交道，她不敢。不过，在她的年纪，好奇心总是有的。当一些有气派的男子和她的船接近时，她和她的女伴，会故意出来，让男子们看到，有时，她们会在船上歌舞——

男士们的船会跟踪她们——

她们在兴致好时，也会在城郊停舟，上岸小行，并进入河岸的亭子小憩。

杨玉环并不很注意自己的姿容，但是，人们却注意到她了，人们发现，这位衣着不大华贵的少女，明眸皓齿，亭亭秀发。

于是，有人探听——杨玉环虽然爱玩，但她很谨慎，尽量避免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她怕一旦传了开去，被父亲知道，自己会被关在家中不许出来，在这方面，她很了解父亲。

但是，天生丽质的杨玉环，终于为人所发现了。

亲戚间对玉环长得好看，虽然没有特别渲染，但另外一些人却瞩目了。

杨慎名的家眷自长安移居洛阳，住定后，来访杨玄璈家，他们是同族，子女自然要出见的，于是，杨慎名夫妇用了非常的口气称誉玉环的美。

杨玄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儒臣，对于女儿姿色，不予重视，但这又是矫情的，他暗自喜欢儿女的美丽。对于人们的称誉，表面不在乎，但实际上极为乐意。

杨慎名的妻子，在见过玉环一次之后，便邀她到本宅参加内室宴会——杨慎名三兄弟，如今都在洛阳，次兄慎矜官监察御史兼太府出纳，长兄慎余，先官吏部郎中，到洛阳不久，又兼宫内官，为太府少监。这三兄弟虽然是亡国皇孙，却声势显赫，交游不仅止于朝臣，兼及宫廷和皇族——那是因为他们三兄弟都有宫廷职务。杨慎名兼主的含嘉仓，为供应宫廷和禁军的。仓库自成一个城，西墙和宫城的东墙相接，又有一部分墙垣和东宫城相接，含嘉仓城的北门是德猷门，门外是宫苑禁区，东面出含嘉门，有一条大路通永福门，大路的两边，都是衙署、大理寺、少府监、军器监、尚书省……